

试论《古兰经》注释中的文化内涵*

金忠杰

《古兰经》的问世，既催生了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也为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文化进步和学术繁荣做出了贡献；既改变了7世纪转型期的阿拉伯社会并促成了阿拉伯伊斯兰王朝的建立，也一如既往地影响着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以及各穆斯林民族的现状与未来、社会与经济、文化与教育、思想与行为等。鉴于《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社会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具有的深远影响，历代经注学家根据他们对它有关段落的理解和注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并力求通过经注彰显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与时代导向。

关键词：《古兰经》 注释 文化内涵

作者 金忠杰，1973年生，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副院长，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宁夏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伊斯兰学术界认为，从发生学来讲，伊斯兰文化本质上是“古兰经文化”（Al-thaqāfah al-qur'āniyyah），它以《古兰经》为文化本源，立足古兰学、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与教学法等核心学科，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本体文化的同时，本着开放精神，博采众长，吸收了希腊哲学、罗马政治、波斯文学、印度数学，以及中国四大发明等外来文化因素，延伸和拓展至人文社会与理工医农等学科领域，通过信仰化、社会化、学说化与生活化形式，构建了作用于穆斯林社会个体与整体的综合性独立文化体，成为世界主要文化体系之一。

伊斯兰教体制与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形成，不仅建基于其渊源经典《古兰经》，而且是建立在该文化体系对《古兰经》的注释上，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古兰经》注释学（Tafsir al-qur'ān，简称经注学），成为指导和帮助穆斯林解析和实践《古兰经》内容、彰显其价值意义、阐发其文化内涵的不可或缺的主体学科。换言之，《古兰经》亘古不变，变化的是对它的不断注释。因此，历代穆斯林经注学家根据经注学要求，“信经而不僵经，释经而不越经”地注释《古兰经》微言大义的学术举措，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承载方式。

细究《古兰经》注释，它的注释历史——口耳相传和文字记录，注释种类——传闻注释、见解注释、专题注释、示意注释与科学注释，注释内容——语言学注释、法学注释、哲学注释、苏菲注释，注释派别——逊尼派注释、什叶派注释、哈瓦利吉派注释、穆尔太齐赖派注释与近现代教派注释，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学术活动的纵深发展。历代经注学家出于各自教派、学派与学科目的而推出的风格迥异、内容不一、含有时代特色、富有社会烙印的各类注释成果，为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提供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思想资源与精神养分。本文因笔力所及和管窥所见，只能以点带面，试着阐述《古兰经》注释蕴含的部分文化内涵，以求教方家。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兰经》注释研究”（06CZJ007）的后续成果之一。

一、《古兰经》注释是伊斯兰文化活动的最早实践

伊斯兰文化体系形成(610—750)前的文化学术活动,相对文化体系形成后较为单一,主要是定本《古兰经》、整理圣训、阐经释义、传述圣训、解读训喻、创制教律、叙述历史、布道传教等。这些文化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是《古兰经》注释活动。《古兰经》注释与《古兰经》启示几乎同步亦趋。因此,伊斯兰文化体系早期注释《古兰经》的学术举措,成为穆斯林实践,甚至构建伊斯兰文化及其学术活动的最早范例。同样,《古兰经》注释成果借助圣训学家搜集和整理圣训成册的平台,不仅作为伊斯兰文化体系中最早见诸文献的学术成果问世,而且形成了独立的文化学科——《古兰经》注释学,既是伊斯兰文化体系中最早的主干学科,也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学科之一。

学界认为,由于注释《古兰经》的学术活动是伊斯兰文化的最早实践,因此,《古兰经》注释也是体现伊斯兰早期文化学术活动的主要资料和学术途径。换言之,早期穆斯林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环境,总能通过注释《古兰经》的学术举措和文化活动,使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与时俱进,表现出生生不息的活力,从而既为当时及至后期的穆斯林解决了如何全面了解、正确理解和具体运用《古兰经》的问题,也阐述了《古兰经》宗教内涵与社会应用相结合的二元一体性;既揭示了《古兰经》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与深刻的现实意义,也回答了伊斯兰教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步伐;既反映了经注精神与历代穆斯林政权政策的相辅相成,也展现了经注内容与时代要求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相协调。尤应指出的是,早期的《古兰经》注释活动,为后期伊斯兰文化的丰富和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信作用,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

二、《古兰经》注释构建了伊斯兰文化机构的雏形

伊斯兰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清真寺之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古兰经》28次直接提及清真寺,^①15次以“房屋”指称“清真寺”,^②分别“与建设、教育、稳定、安宁、提升信仰、完美道德、陶冶情操等内容紧密相关”。^③其次,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宗教与社会生活中对清真寺从言论到行为、由理论到实践的“圣行”,赋予它重要地位。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圣寺后,使它成为穆斯林履行宗教功修场所的同时,也利用它从事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活动。单就文化教育而言,先知穆罕默德在清真寺“举行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讲授《古兰经》、解释《古兰经》经文、圣门弟子在寺内记录他的训喻。在先知寺一角,矗立着一个讲台,作为活动的中心地点,以方便旨在了解信仰、祈祷和其他事物的人。这是极其简单的教学方式,但以后就形成了一种有组织、固定的教学方式。”^④据此,先知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的奠基者和实践者。继他之后,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秉承“圣行”,“在清真寺组织教学活动并视之为政府的责任。一位穆斯林历史学家记载了伊历十七年各清真寺学生满堂的情景。当时,欧麦尔派遣教师到各伊斯兰城市求学。”^⑤清真寺“在伊历三世纪和四

① 这些经文分别是:2:114、144、149、150、187、196、217;5:2;7:29、31;8:34;9:7、17、18、19、28、107、108;17:1、1、7;18:21;22:25、40;48:25、27;72:18。

② 这些经文分别是:2:125、127、158、189;3:96、97;5:2、97;8:35;10:87;14:37;22:26、29、33;106:3。

③ 祁学义:《从伊斯兰史上的著名清真寺看清真寺功能的多样性》,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1期。

④ 哈立德·阿拉维:《清真寺的社会职能》,金忠杰译,伊斯兰堡伊斯兰研究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4页。

⑤ 同上,第14页。

世纪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教学活动图景。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以及内沙布尔的著名清真寺,都作为文化教育中心享誉而立。”^①“穆斯林城市所有的清真寺,差不多都用作重要的教育中心。一个游客,来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只要走进当地举行聚礼的清真寺,就一定能够听到圣训学的课程。每个穆斯林,都可以自由地到清真寺里去听讲,这种教育制度,跟伊斯兰教的学校一起,保存到十一世纪。”^②

追溯经训渊源,清真寺具有的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功能,成为伊斯兰文化机构的雏形。彼时,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在麦加禁寺、麦地那圣寺与伊拉克的清真寺创建了传授伊斯兰知识、传播伊斯兰文化的“学校”(Al-madrasah)。如饥似渴求知的穆斯林们纷纷师从尚在世的圣门弟子,聆听他们讲解《古兰经》、传述先知圣训、教授宗教知识、叙述先知历史等,并在不同城市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学校或学派,“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的学术造诣,各不相同,他们派到各地之后,都依照自己的思想与学识建立学校,传授学问;结果地方受了他们的影响,都依循着他们的途径。于是各地自成派别。”^③这种学校形式,就是圣门弟子在清真寺一个角落居中而坐,再传弟子环绕他们形成“讲席”,“不仅讲授宗教学科,而且讲授语言学 and 诗学。”^④在各科“讲席”中,尤为著名者莫过于《古兰经》注释讲席,并在再传弟子时期形成了现代术语所称的“《古兰经》注释学校”(Al-madrasah al-tafsiriyh)——除三大注释学校即麦加注释学校、麦地那注释学校和伊拉克注释学校外,还有规模相对较小的叙利亚注释学校、埃及注释学校、也门注释学校。毋庸置疑,《古兰经》注释学校依托清真寺的建立,是早期伊斯兰文化机构建立的雏形,既是传承《古兰经》注释的中心,也是伊斯兰文化体系逐渐形成的一个标志。

三、《古兰经》注释是伊斯兰文化的综合体现

伊斯兰文化义理中,无论从整体角度还是个体层面看待《古兰经》,均需注释。注释是历代穆斯林全面了解、正确理解和具体实践《古兰经》的必然途径。同样,《古兰经》内容丰富的性质,决定了注释内容的广博。可以说,《古兰经》宗教与社会的二元一体结构,涵盖了信仰哲学、教义教律、宗教义务、社会义务、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工农牧商、故事教诲、对话辩论等内容。这些内容,几乎囊括了伊斯兰文化从精神到物质的各个层面。因此,历代经注学家根据经文内容和要求,无论从宏观与微观层面,还是从整体与个案角度——诸如从教义学、法学、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经济学、遗产学、语言学、句法学、词法学、修辞学、韵律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层面,以及从伊斯兰宗教思想、文化思想、社会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历史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法律思想、科学思想等各种思想和穆斯林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观、价值观、道德观、生活观、行为观等各种观念层面,对《古兰经》有关段落所作的或详尽或简略,或整体或局部的注释,“将古兰经注编写成包罗万象的伊斯兰知识文库,”^⑤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一种综合体现和具体反映,注释成果也在伊斯兰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① 哈立德·阿拉维:《清真寺的社会职能》,第14页。

②④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9页。

③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2页。

⑤ 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四、《古兰经》注释是伊斯兰文化合流的体现

穆斯林根据《古兰经》，认为伊斯兰文化是开放的、跨疆域、跨民族的外向型文化，不是封闭的内向型文化。因此它在和其他文化体系交流过程中，不断汲取其他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来丰富本体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吸收其他文化养分过程中，《古兰经》注释受到或多或少地影响也就在所难免。诸如，哲学家法拉比和伊本·西那等受希腊哲学影响，借用希腊哲学观点注释有关经文。^①诚然，尽管学术界对借用希腊哲学观点注释《古兰经》的作法见智见仁，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无疑是伊斯兰文化渊源合流的一个具体反映。也就是说，《古兰经》注释是穆斯林学术界在解析古兰经义、阐发伊斯兰义理的基础上，延伸和拓展伊斯兰文化的平台。它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文化学术成果，丰富着伊斯兰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推动着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的整体发展。

就伊斯兰文化体系内部而言，各穆斯林民族注释经文的学术活动，共同构建了《古兰经》注释的整体格局。因此，穆斯林各民族用母语注释《古兰经》的成果，是全体穆斯林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和学术成果。首先，从经注学家所属民族角度来讲，既有阿拉伯民族的学者用母语注释《古兰经》，也有其他民族的学者用阿拉伯语注释《古兰经》，如出身波斯的泰伯里和法赫鲁丁·拉齐等，“都受过阿拉伯语教育的巨大影响，精通阿拉伯语；他们的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而且都是在‘伊斯兰旗帜’下产生的，都打上了‘伊斯兰精神’的烙印。”^②这些学者精通并熟练运用阿拉伯语注释《古兰经》的学术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古兰经》注释典籍的质和量。其次，从注释《古兰经》的语言角度来讲，既有《古兰经》源语——阿拉伯语——的注释典籍，也有外语的注释成果。诸如，波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英语、德语、汉语界的《古兰经》译注家，分别用母语注释《古兰经》的作法，催生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注释成果，如波斯语的《侯赛尼经注》、乌尔都文的《古兰经光辉》、汉语的《古兰经译解》等。经注学家采用其他文化观点注释《古兰经》有关段落，以及用各种语言通篇注释《古兰经》的成果，不啻为伊斯兰文化渊源合流的一种体现形式。

五、《古兰经》注释推动伊斯兰文化学术发展

伊斯兰文化史上，《古兰经》注释不仅发展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其成果绵延不绝，各类注释典籍百花纷呈。同样，它的学科性质也成为伊斯兰文化的学术理论宝库，极大地推动着其他学科学术的发展，无论是与其相关的交叉学科，还是受其影响大力发展的学科。

首先，《古兰经》注释学的形成，要求凡注释《古兰经》者，必须精通经注学界定和需要的15门学科——语言学、语法学、词法学、字源学、辞达学、辞巧学、辞华学、诵读学、教义学、法理学、经文降示背景学、先后经文停止学、教律学、圣训学、禀赋学。^③由于注释学精深细微的要求所致，注释学与这15门学科呈现学科交叉和互补互用的格局。因此，注释学界为精确和准确注释《古兰经》，遂致力于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使其精益求精，更加完善，成为注释《古兰经》的必然学术工具。

① 详见金忠杰：《论〈古兰经〉的哲学注释》，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6期。

②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译者序言》（第1册），第8页。

③ 参见金忠杰：《〈古兰经〉注释学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6期；详见哲拉鲁丁·苏尤蒂：《古兰经学通论》，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4—866页。

其次,9世纪,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奉行推动伊斯兰文化全面发展的政策,教义学、教学法、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以及数学、医学等自然学科达到空前的繁荣,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古兰经》注释的学术成果即是其中之一,涵盖了伊斯兰文化的重要学科领域。如果说《古兰经》是这些学科的渊源,《古兰经》注释则是对各学科领域的具体解读,以及推动学术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直接反映。诸如,人文学科方面,法学家艾哈迈德·本·阿里·拉齐·贾萨尼德等从法学层面,哲学家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阿拉比等从哲学层面,泰伯里和塞尔莱布等从史学层面,伊本·哈雅尼等从语言学层面,宰迈赫舍里等从修辞学层面注释《古兰经》,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9世纪以降,以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为主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注释《古兰经》提供了新的空间,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古兰经》注释得以全面深化和大力发展,如法赫鲁丁·拉齐的《幽玄之钥》,从自然科学层面注释《古兰经》,堪称该领域的典范并被后人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经注”。透视这些学科的注释文献,分别反映着经注学家对《古兰经》从文字到内涵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同时,经注学家受时代影响借鉴了与伊斯兰教相关联的学术领域的学术成果,如哲学领域的经注学家受希腊哲学影响在其注释中有希腊哲学思想的烙印。可以说,《古兰经》注释既是各时代伊斯兰文化学术活动的结果,也是对伊斯兰文化及其学科体系的丰富和延伸,两者相辅相成,是彼此影响、互相衬托的学术结晶。

再次,从文化学术理论来讲,伊斯兰文化体系在完善过程中,唯有不断地注释《古兰经》和创新注释理论,才能使伊斯兰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伊斯兰文化体系只有解决了《古兰经》注释的理论创新问题,才能使伊斯兰文化体系的理论创新不断发展;伊斯兰文化体系只有将《古兰经》注释的理论创新作为一个理论创新突破口,方能突破制约伊斯兰文化体系理论创新的瓶颈。反之,如果穆斯林信仰《古兰经》但僵化《古兰经》注释及其理论创新,就会造成伊斯兰文化体系“一障百障”的局面。同理,如果穆斯林注释《古兰经》且不僵化注释的理论创新,就会使伊斯兰文化体系及其理论创新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生命力。换言之,《古兰经》在宗教层面的神圣性和社会层面的严肃性,决定了《古兰经》注释的理论创新对于伊斯兰文化体系的理论创新,很大程度上具有引信和导向作用。

六、《古兰经》注释是伊斯兰教派争鸣的文化反映

《古兰经》注释自始至今,不仅是解释音韵词义、分析降示背景、阐释教义教法的纯宗教学科,也发展成伊斯兰各教派和各学派借以支持本派观点和理论的必要措施和重要手段。

伊斯兰教发展进程中,因穆斯林思想主张的不同与观点看法的差异,形成和催生了宗旨不同的宗教派别和学术派别。各派为维护其思想、观点和主张的合法性、正统性与法理性,皆从《古兰经》中寻求符合和支持本派的经文加以阐释,通过注释宣扬其合法性,论证其观点和主张的正确性。逊尼派的四大法学学派与苏菲,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与栽德派,以及穆尔太齐赖派和哈瓦利吉派等派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主张,都概莫能外。以穆尔太齐勒派为例,该派带有浓厚的神学理论和理性主义色彩。他们根据自己主张的五项基本原则——关于真主本体与属性的统一性、真主公平的必然性、人类意志自由、犯大罪是否具有信仰、理智具有辨别善与恶的能力,通过注释《古兰经》的有关经文,尽力使他们的思想主旨和观点主张与经义相一致。如果找不到支持他们观点的经文,就脱离经文的表层意思,发挥理性加以解释,以维护和服务于自己的主张。由此可见,任何教派与学派对《古兰经》的解析和阐发,都无一例外地折射着历代教派争鸣、学派理论的实际情况,“《古兰经》注不啻是各时代的学术思想、宗教派别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缩影。

由伊本·阿拔斯到穆罕默德·阿布笃都没有例外的、甚至研究任何一时代的经注之后,就可以知道当时学术活动的状况,和当时所流行的学派、教派。”^①

七、《古兰经》注释是研究伊斯兰文化的重要途径

纵观《古兰经》注释的千年发展史,它从口耳相传注释到文字记载注释,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注释过程。经注学家们从诵读韵律、文字辞藻、句法结构、降示背景等表层进行注释,并根据所属派别、学派及学科的不同,从宗教教义、学术思想、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层面深入注释着《古兰经》。历代的《古兰经》注释,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总能引导着穆斯林如何正确理解和具体运用《古兰经》,阐述着《古兰经》宗教内涵与社会应用相结合的二元一体性,揭示着《古兰经》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回答了伊斯兰教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可以说,《古兰经》注释是穆斯林阐发经文内涵、宣扬伊斯兰义理、整理伊斯兰文化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它丰富和发展了伊斯兰文化,被认为是综合研究《古兰经》、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必不可少的珍贵文献,是穆斯林追求知识、探索真理、创新文化的具体体现,“每一部完整的经注都是在某一时代的文化学术活动的影响下出现的,它不仅保存了古兰经研究和伊斯兰文化的有关资料,并为穆斯林学习《古兰经》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而且它还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教派和学派的斗争情况,因而古兰经注历来被认为是研究伊斯兰教必不可少的方面。”^②

八、《古兰经》注释是伊斯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体现

伊斯兰文化领域,两个至关重要的术语始终影响着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延伸。一是“传承”(Al-naql),一是“理性”(Al-‘aql)。“传承”的相应词是“Al-riwāyah”(传述),“理性”的相应词是“Al-ra’y”(见解)。

“传承”意味着伊斯兰文化的循古性和守制性,“理性”意味着伊斯兰文化的创新性和开拓性。这两个术语的作用,在《古兰经》注释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

“传承”在《古兰经》注释领域,是指注释学界溯源和继承前人的注释,既具有文化循古的内涵,也富有文化守制的意义。也就是说,传承是注释学界溯源前人注释,从循古角度代代延续和固守《古兰经》的早期注释内容,即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的注释,并因此形成了专业的学术术语——传闻注释,“就是依据经文和确凿圣训阐释经文,既没有创制地解释毫无证据的意义,也在没有确凿传述的情况下,禁止毫无裨益的注释。”^③

“理性”则是注释学界在遵循经训教义,以及教法法理与注释学理的原则基础上,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事物,运用个人理性,发挥个人见解,本着创新原则与开拓精神,注释和阐发《古兰经》的经义经旨,从而推动《古兰经》注释与时俱进地发展,也因此形成了专业的学术术语——见解注释,“指在包括经、训在内的传述材料中找不到解释经文的基础时,可按注者个人的理解或见地对经文作阐释性的解释,但这类解释者必须具备高深的宗教学造诣并对阿拉伯语文和先知历史有相对根底等条件。”^④

如果从界定《古兰经》注释种类的宏观角度来看,注释不外乎两大类型——传闻注释和见

①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第220页。

②④ 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180页。

③ 法赫德·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解注释。传闻注释之外任何形式的注释，都在见解注释的范畴内。据此，《古兰经》注释展现了它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作用——注释学界通过循古式的“传承”方法，完全继承了前人的注释学术传统和学术思想，保护性和循古性地延续了伊斯兰早期的注释学术成果。同样，注释学界通过具有原则的、创新式的“理性”方法，发挥他们的学术创新精神，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文化进步和科技发展等因素，不断更新学术思想和拓展学术眼光，最终达到没有因为循古式传承而忽略理性式创新注释的目的——既循古也创新。

鉴于“传承”与“理性”的特殊关系和学术作用，经注学界认为，如果没有循古式的“传承”注释，《古兰经》注释将会因失根失据而出现偏颇甚至错误和失真现象；如果没有基于原则的创新式“理性”注释，《古兰经》注释就不能与时俱进地发展，注释内容及其内涵与外延，也必会受到制约和障碍，甚至会有“注释僵化”和“僵化注释”的情况发生。因此，“传承”与“理性”在《古兰经》注释领域的有机调和所形成的既相辅相成和互为依托，又彼此作用和相互牵制的格局，有效保障了伊斯兰文化体系“信经而不僵经，释经而不越经”的注释图景。同样，两者共同推出的卷帙浩繁的注释成果，成为伊斯兰文化体系“传承文化与创新文化”的坐标和体现。

（责任编辑：李建欣）